

瑣談與斷想

黃秋耘

丁巳秋
黃秋耘

瑣談與斷想

黃秋耘

责任编辑：李屏锦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350×1168毫米 1/32 7 1/2印张 3 插页 177,000字 印数：1—10,050 1983年7月新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91 定价：0.75元

前　　言

这本集子收编了我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所写的四十篇文艺评论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收进过《古今集》和《苔花集》里，有一部分是未收进过集子的或者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所写的新作。第一辑是关于现代文艺作品（主要是小说）的论文，第二辑是短论和读后感，第三辑是关于古典文艺作品的论文和读书札记。文章涉及的方面虽各有不同，形式也千差万别，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作者对于文艺作品是有他自己一贯的看法和评价的，当然也难免会有些偏见。

集子中这些文字，大部分都是一些片断的、零碎的随感，而不是什么系统的、完整的科学论证和分析，严格地说，恐怕不能算是文艺评论文章。因此，命名为《琐谈与断想》，只是取其名实相符而已。

集中文章的编排并不以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大体上把评论新作和重新出版的作品的文字放在较前的位置。辑集时除了文字稍作一些删改外，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动。凡是收进过近年出版的集子的文字，一律汰去，以免重复。

这些文字的写作时间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之久。这二十多年来，世局如棋，天翻地复，而文坛上的风云变幻，更是使人惊心。作者不才，不识时务，因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往往被目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自然没有资格去吹捧什么“三突出”之

类的样板戏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伟大作品”，所以幸而不至于堕入魔道，被逼作违心的谬论，贻尘谤于世人。在十年浩劫期间，我只留下一片空白，既没有献媚“首长”、求官干禄的效忠信，也没有挥斥风雷、斗妖讨怪的檄文。我也颇有那么几个“慷慨多奇节”的故人，后来都一个个饮恨吞声地离开了人世；我所评论过的那些作者，也有好几个都早已“灰飞烟灭”；而我自己，只不过是个“草间偷活”的幸存者罢了！

今天出版这部集子，只不过想把它献给那几位已故的作者和老朋友的“在天之灵”。值得告慰于他们的，我虽然是一个幸存者，但还不想做一个苟活者。我还要做一点事情，也许，这只不过是不自量力和无补于事的尝试。然而，不这样做，我又何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死者？

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假如不是由于他们的热心帮助和督促，这本集子不可能这么快就问世。一个人本来应当“悔其少作”的，这里辑集的文章还是“少作”居多。我希望能够多多听到前辈们、同行们、读者们的意见和批评。

作者 一九八〇年三月一日

目 次

一篇勇于干预生活的力作

——喜读特写《人妖之间》 (1)

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 (5)

从微笑到沉思

——读茹志鹃的几篇新作有感 (11)

《山乡巨变》琐谈 (17)

孙犁作品的艺术特色 (30)

一部诗的小说

——读《风云初记》 (38)

闲话《花城》 (48)

革命春秋的序曲

——喜读《三家巷》 (52)

初读《苦斗》 (62)

“碧血千年热，红花此日春”

——《红花冈畔》读后感 (72)

一部用生命写出来的书

——读《小城春秋》 (77)

科学和诗的结晶

——略谈高士其的儿童科学文艺创作 (84)

乘风破浪显英雄

——略谈陆俊超的作品 (92)

新时代生活的画卷

- 略谈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 (99)
建国十年来突飞猛进的兄弟民族文学 (116)

一部别开生面的书

- 读《未完成的画》 (132)

“高吟肺腑走风雷”

- 关于鲁迅先生几首旧体诗的杂感 (134)

空谷足音

- 《陶渊明写〈挽歌〉》读后 (138)

情景交融的风俗画

可贵的是阶级感情

- 《长长的流水》读后 (142)

故乡有此好湖山

- 关于《山水阳光》的短笺 (145)

我喜爱这些“贝壳”

- 《贝壳集》读后 (148)

《李慧娘》的改编

写在读《山径崎岖》之后

“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 读《明净的水》 (158)

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

- 读《红色堡垒》 (160)

可歌可泣的《吉鸿昌》

伟大心灵的颂歌

- 介绍捷克斯洛伐克传记片《血的秘密》 (168)

发人深思、感人肺腑的好戏

- 《霓虹灯下的哨兵》观后感 (173)

话说《巴黎圣母院》	(177)
寒夜话《聊斋》	(180)
《婴宁》浅析	(188)
略谈《封神演义》	(192)
《红楼梦》琐谈	(199)
学杜厄言	(205)
重读《人间词话》	(212)
请读《一瓢诗话》	(218)
向《永州八记》取点经	(222)
管窥“孔雀”片羽	(225)
读《宋诗一百首》	(230)

一篇勇于干预生活的力作

——喜读特写《人妖之间》

二十多年前，刘宾雁同志以他的两篇大胆干预生活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震动了文坛，不，应当说，震动了全国。不幸的是，这两篇特写和一些杂文，竟给他招来了意想不到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虽然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霜雨雪的磨难，刘宾雁同志却心无余悸，斗志益坚，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又以文坛闯将的雄姿，一连写了几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他这种坚决作人民代言人的使命感和正义感，是值得称道的。

最近刘宾雁同志发表在《人民文学》九月号上的长篇特写《人妖之间》，又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和好评。这篇特写完全取材于真人真事，它写的是黑龙江省宾县大贪污犯王守信的罪行。

王守信的大贪污案之所以震动全国，骇人听闻，不仅由于她的贪污赃款多达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而且由于她党羽之众，权力之大，为害之烈，牵涉面之广，都足以使人惊心动魄。论职务，她起初不过是一个县的燃料公司的收款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凭借县武装部杨政委的支持，也不过爬上了燃料公司经理、支书、县商业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论才能，她斗大的字也认识

不了几升，除了腐蚀人、拉拢人、结党营私以外，什么能力也没有。论名声，她从年轻时代起就是个寡廉鲜耻、臭名远扬的“破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妖婆”，竟然神通广大到如此程度：一连几任县委第一书记，不是对她低头屈服，甚至同流合污，就是被她排挤走。她的黑手还伸到了县外和省外，黑龙江省经济委员会的一位聂副秘书长和一位来自商业部的副局长都跟她“拉上了关系”。甚至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她从哈尔滨机场起飞到南方旅行的时候，竟然有三个省级部门的领导人驱车亲临送行。到了上海和广州，都受到规格颇高的接待。她的大儿子当上了公社副主任，儿媳妇当上了县革委会文革副组长，她的友好和亲信个个青云直上，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她不但实现了“全家红”（入党做官就是“红”的标志），还可以对她“统治”下的“臣民”实行“全面专政”。她想要批斗谁就批斗谁，整得检举过她和反对过她的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要是她看上了谁，认为这个人听话，肯老老实实跟她干，愿意做她的爪牙和死党，就马上可以发展他入党。她自己就是在百分之七十党员反对的情况下经过杨政委“特批”入党的，而这之后，经过她“指定”入党的党员竟达十一人之多。

人们会问，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横行霸道、耀武扬威、目无法纪的“妖婆”？更为奇怪的是，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两年多，为什么她仍然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安然无恙，逍遙法外？

刘宾雁同志这篇特写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只是淋漓尽致地描述了王守信这桩特大贪污案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而且笔锋向纵深发展，以政论的语调夹叙夹议，对这个事件作了深刻的科学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绝妙的反面教材；同时还通过解剖王守信这只非同小可的“麻雀”，揭示了有利于大大小

小的王守信利用特权进行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等罪恶活动的特定社会条件，点明了“好人不香，坏人不臭”、“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的原因所在。他写道：

人和人之间错综复杂、重重叠叠的关系，已经织成一张又厚又密的网。什么马列主义原则，什么党的方针政策，一碰到这张网，就象触了电，不灵了。一家企业叫这张网缠住，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走样；一桩案件落入这张网，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被歪曲。是非混淆，赏罚颠倒，真理屈从于谬误，善良受制于邪恶。

这张网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不妨想想看，受过王守信“好处”的，就一共有二三百人之多。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想“明哲保身”，怕得罪人；特别是怕得罪那些拥有既得利益的“造反派”。在“有权就有了一切”的反动思想影响下，还有什么坏人坏事不被包庇下来呢？特别是做坏事的是有权有势的“官”。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一位比较明智的士大夫痛切地说过：“国家之败，由官邪也！”^①王守信这桩大贪污案，通过特写《人妖之间》艺术地展示了出来，使我们不能不触目惊心地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林彪、“四人帮”多年来作祟的恶果之一，就是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官邪”。的确有那么一些王守信以及扶植她和她所扶植起来的人物，在侵蚀着党的肌体，侵蚀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侵蚀着十亿人

^① 这是春秋时代鲁国大夫臧哀伯的话，见《左传》桓公二年。他的意思是说，官员们不走正道，会给国家造成莫大的危害，导致国家败亡。

——作者

民的基本利益。当然我们的同志中也有被侵蚀而有“官邪”表现的：有的用人唯亲，有的大搞特权，有的开后门和走后门，有的贪污受贿，有的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有的制造和包庇坏人坏事等。王守信一伙则是集大成者，在他们把持的地方，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严重损害，他们已为广大有正义感的人民所不容，一定要依法严惩，以平民愤。

要消灭“官邪”，首先当然要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恶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应当以特写中所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煤建公司计划统计员刘长春和县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为榜样，坚持真理，不畏强暴，把个人的祸福安危置诸度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对邪恶势力和不正之风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今天，我们大家的政治觉悟和分辨是非的能力都提高了，但是，要把是非之心放在个人利害之心之上，却是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得到的。特写《人妖之间》的作者所期望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就是希望他们懂得，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封建传统（包括特权思想、等级观念、世袭制度、专制主义等等）本来就根深柢固，林彪、“四人帮”又推波助澜地使之向社会各个毛孔里渗透，要把它肃清，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写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肃清林彪、“四人帮”遗毒的依靠和力量所在。只要我们勇于斗争，善于斗争，“是”终归会战胜“非”，“正”终归会压倒“邪”，在这一点上，它坚定了人们的信心，增强了人们的勇气。我不相信，我们十亿中国人民，三十九百万共产党员，就斗不过这么一小撮大大小小的王守信。

1979年10月

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

我不太熟悉张洁同志，照理说，我是没有资格评论她的作品的。何况，要认真地评论张洁同志的作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作品，是她的独特的艺术个性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她的人格的结晶。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写文章的人，或许能描绘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细腻的心理活动，却往往不能分析清楚，作者本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状态。”

（见《起步》）那么，笨拙的我，又怎能分析清楚她的创作时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状态以至她的艺术个性呢？假如我只是用一些社论式的政治术语和文艺评论的行话去评论她的作品，给作品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我肯定会曲解甚至亵渎了这些精致的艺术品，那么，我还是干脆不写为好。

因此，我必须郑重声明，这篇文字所记录下来的，只限于一些直觉的、粗浅的印象，一些片断的、零碎的感想，而不是什么系统的科学的论证和分析。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文学评论文章。

二

我记得，高尔基曾经说过：“我们读着安东·契诃夫的小说

的时候会有一个印象：仿佛在一个忧郁的晚秋的日子里，空气十分明净，光秃的树木，窄小的房屋和带灰色的人都显得轮廓分明。”（见《文学写照》：《安东·契诃夫》）我们读着张洁同志的小说和散文的时候，是否也有类似的印象呢？有的。但是我还有一种独特的印象：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它们有点不可捉摸，但是它们又是那么强烈地触动读者的心弦。正象我们读契诃夫的作品时所感觉到的一样，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灵和读者的心灵，好象是一对频率相同的音叉，敲响了一个，另一个就自然而然地跟着共鸣和振动。这是不是纯粹个人主义的“音叉”所引起的共鸣呢？如果是这样，契诃夫就不会成为旧俄时代的杰出作家，更不会成为高尔基的良师益友。同样的，张洁同志的作品中也蕴藏着对于与社会正义相对立的“非”的鄙视和憎恨，尽管多少有些伤感，否则，我们就不会为之动心。

应当指出，这样的境界，这样的情调，是作者所特有的，至少在当前中国文学领域中，我们还很难读到相同的甚至是类似的作品。

我不能用准确的、科学的语言来说明产生这种艺术效果的原因。但是我猜想，这也许和作者的艺术风格不无关系。张洁同志的作品并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甚至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着重去描绘人物的行动和笑语音容，而只是倾注全力去刻划人物心灵深处的微妙活动。她所写的，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小说和散文，却具有近似于音乐和抒情诗那样的艺术魅力，象音乐和抒情诗那样的打动人。如所周知，音乐和抒情诗是不能叙述故事情节的，也不擅长于描绘人物形象，它们只能倾诉于人们的心灵。

三

假如允许我作进一步猜想，作者大概是不会带着笑容和幽默感去观察生活的，而总是皱着眉头、带着沉思的神态去观察生活。她对严酷的现实生活有时感受到揪心的痛苦，但是她绝对不会号啕大哭，把痛苦尽情发泄出来，而只是咬紧牙关，抑制着自己的热泪，竭力把痛苦缄藏在心底。敏感的读者不难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充满着悲悯的深沉的感情。这种感情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而在《忏悔》中表现得最为凝炼而深刻。

作者曾经用过“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这么一个词儿，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她自己。“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是纯洁的，但是在任何时代，他们都只能是悲剧人物。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为悲剧人物。但愿，我的猜想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

四

有些读者也许认为，张洁同志所写的，大部分都是爱情故事。例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从题目到内容，大概总会被人们当作爱情故事来读的吧。关于这，我倒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

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些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五

作者或许已经意识到，由于她过于执着地去探索生活的悲剧性，总有一天，会给她和她的作品带来无穷尽的非议。有时候，她有意给一些充满着感伤情调的作品挂上一条光明的尾巴。比如《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她大概想让读者们“破涕为笑”吧。可是，涕泪是真实的，而笑却显得有点勉强。我们为作者善良的愿望所深深感动，但还是不能相信，这个善良的愿望竟会那么容易变成现实。我们坚信，我们的社会必然会一步步前进的，我们的生活也会一天天变得更加光明和更加美好的。但，任何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人都会承认，人类社会每一步前进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只不过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而且，我们大概还免不了要继续做一些使别人和自己都痛苦的蠢事和错事。我们不需要绝望的悲观主义，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廉价的乐观主义。假如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悲剧，还是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写吧！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看来，作者大可不必过分介意别人的议论，也不必过分担心这样的作品是否会“不合时宜”。

六

有人提出，张洁同志很少写重大题材，也就是说，她很少对涉及人民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发言。不知道是由于她“心有余悸”，有意识地回避这方面的题材，还是由于她的艺术风格不适

宜于创作这一类史诗式和政论式的作品？但我总觉得，她的是非观念和爱憎之心都是非常强烈的，她很关切普通人的命运，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回避涉及人民和国家命运的问题。不过，她很少从正面写，而更多地是从侧面写。例如在《谁生活得更美好》中，她辛辣地讽刺了那个自命不凡、装成一副“趣味高雅、思想深奥”的模样而实际上灵魂卑鄙肮脏的吴欢，而热情地歌颂了那个对待生活和工作都十分严肃认真而且具有极高的美的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的女售票员，这难道不是关系到当前我们青年一代的理想情操、道德风尚的重大问题么？这样的作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恐怕也不在《窗口》和《班主任》等作品之下吧。文学作品当然应当干预生活，但干预生活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张洁同志是以“契诃夫的方式”来干预生活的，她轻轻地叹着气对那些应当受到谴责的人们说：“同志，你生活得可不那么好！”

七

直到今天为止，张洁同志只发表过十多篇作品，要全面地论述她在创作上的成败得失，未免为时过早。况且，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虽然十分喜爱张洁同志的作品，但是要我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综合的分析，这恐怕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她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她这十多篇作品中，无论是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也好，还是千把字的散文也好，无一不融化着和突现着她鲜明的艺术个性。假如随便把她的一篇作品涂去署名，掺杂在许多作品之中，我相信，一个细心的读者不难分辨出哪一篇是出自她的手笔。因为从意境情调到思想语言，都是她所特有的，是别人所代替不了的。记得不久前有一篇文章

章写道：“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做一件在今天并不很容易的事。那就是：表现我。”张洁同志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的。我们所殷切期望于她的，是发展、提高而不要轻易抛弃、改变她所特有的艺术风格。当然，我们也希望作者能够更进一步扩展她的视野，文风更为明快一些。

1979年12月